



让古老的唐卡技艺焕发新生

口述 西藏唐卡画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唐卡勉萨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贡觉杰
整理 章正

我叫贡觉杰，是一名85后唐卡画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唐卡勉萨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去年，我创作的唐卡《格萨尔王赛马节》被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永久性收藏。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可存放数百年，传统唐卡创作以金、银、珍珠、玛瑙等珍贵的矿物宝石和藏红花、大黄、蓝靛等植物为颜料，绘制程序极为复杂。画好唐卡，最重要的还是基本功。这道工序，就是用比铅笔还细的猫毛笔，细致地画出唐卡轮廓，整个过程不能断线。

7岁时，爷爷觉得我的绘画作品有灵气，决定让我学习唐卡，成为家族第五代传承人，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罗布斯塔达学艺。

师傅告诉我：学习唐卡，要有心力。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无尽的重复、枯燥。

天还没亮就要起床，背诵传统度量学。9点左右，师傅抽查完背诵内容，才能吃早饭。从白天开始练习勾线，把月亮都勾到了天上，才能休息睡觉。

我也曾想过放弃。爷爷没有责备我，一边喝茶，一边给我讲故事：我以前画完一幅唐卡，别人给一点酥油、青稞养家糊口，现在可不一样了，你只靠学习就行，生活上不用操心，我们培养你，你也是家里的希望！

打这开始，别人上茶馆聊天，我就在画室研究勾线，别人喊我打球，我依旧埋头练习。

之后，上色、勾线、打金，我又花了3年时间学习。

7年过去，在师傅罗布斯塔达眼里，15岁的贡觉杰才达到入门级别，但技艺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增长。

我觉得，画好唐卡的秘诀只有两个字——坚持。

藏族谚语说，踏踏实实爬山，昆仑山也能上去，爬三步都后悔的人，小土坡也上不去。

水平提高了，但我很快遇到了瓶颈。有一次，外出交流绘画，面对参观者的提问，我一肚子话想表达，可普通话不好，憋着说不出。

2008年，我进入拉萨的一家夜校学习，从汉语拼音学起，两年后，我的普通话说得顺畅了，交流的机会也多了。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唐卡内涵十分丰富。我想尝试在历史题材上寻求突破，技法借鉴国画。听说国画有写生手法，2016年，我来到清华大学进修。

我尝试把山水和鸟的元素嵌入唐卡作品中。回想起第一次创作融合，我感觉勾勒不出不一样的雪山、湖泊与森林。

当时，不少师生对藏族唐卡绘画很感兴趣，专门邀请我为他们讲授了一堂关于唐卡绘画技艺的讲座。

两种艺术流派之间充分地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半年后，我带着优秀结业作品《宗喀巴》结束了难忘的清华之旅。

如今，我在画作中融入新的元素——写生。

借鉴国画的一些方式，我加入写生的元素，山水和动物，在唐卡中显得灵动起来。去年，我凭借4组唐卡《四季花》斩获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首届艺术节的艺术类金奖。

创新，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必须有厚实的传统技艺打底。唐卡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要与其他的画派进行交流，但绝不是丢掉自己的传统，而是在互动中相互提升。

如今，唐卡不断创新，尝试走进大众美学，让更多人能够接纳并欣赏其美。

可是传承，有何高招？

西藏唐卡画院有一个特点：之前每年面向贫困学生招生，性别、年龄、民族都不限，学费全免，只要求学生能坐得住。我们现在有3个班，初级、中级和高级班，40多名学生。

与我小时一样，这里的学生周一到周六在画院练习白描、上色，下课后还要在宿舍里练习勾线。

但我体会到，学习唐卡还是要有文化基础，对绘画的艺术理解更到位。我鼓励徒弟们，至少上完高中之后再学习唐卡。而今，在这里，学历最高的徒弟是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也不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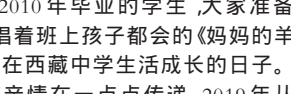
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唯学历论。我和师傅罗布斯塔达都认为，应从学生的长远发展考虑，唐卡传承应与现代发展对接。

与传统教学方式不同，我们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比如一些重要展览，我会带着学生参与，既向别人学习，也要展示自己。

如今，我带着徒弟，多次参与西藏文物保护单位的壁画绘制、修复工程。算下来，10年间，西藏唐卡画院共培养了300多名优秀的唐卡画师。

我也常常提醒学生，画唐卡，光靠嘴巴甜可不行。我们只有在达到前辈水平的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尝试创新，发展的空间才能更大。

我们在这里 青听 民族教育一线的声音，投稿邮箱：zqbmzjy@163.com



大手拉小手 带山里孩子玩转科学

聚焦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刚来到依山而建的为民小学支教时，郭子鸣发现，别说是5G、航空航天相关的科技前沿知识，这里的孩子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很缺乏。有些学生直接对着教室外的水龙头喝水，用个盆接能看到水里都是青苔。

在贵州省大方县狗吊岩村这所只有5名教师的小学里，科学课曾经只是奢望。在支教教师来之前，有时语文课、数学课都要两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起上。

2020年8月，郭子鸣和另外4名志愿者本科毕业后，接过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第十六棒。这次，他们带来了人体模型、显微镜、三球仪等孩子们从没有见过的稀罕玩意，还把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玩转科学课堂带到这个闭塞的彝族村落。

除了为民小学，在贵州毕节的大石希望小学、本禹希望小学以及湖北的摩峰中心小学，华中农业大学支教团不仅每周开设科学课堂，还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建立了配套图书室、实验室和种植实践基地，大手拉小手，让大山深处的孩子看到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贫瘠的科学土壤

大方县以喀斯特地貌为主，耕地破碎，交通不便。为民小学没有班车，有些孩子回家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郭子鸣刚来这所学校时，100多个学生挤在只有两层的教学楼里，楼前的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虽然此前郭子鸣和其他志愿者就通过线上授课的形式，结识了这些小网友，但真正看到这里的实际情况后，他们不免有些忐忑，担心孩子们在科学课上听不懂、没兴趣。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参与度，志愿者们将课堂讲授、播放科普短视频、动手操作科学套装和实地体验相结合，从环境保护、自然地理、生命科学、园艺种植4个板块入手，根据年级高低调整课程的难度和深度。由于这里的孩子们基础知识较弱，志愿者们得把一个知识点揉碎了反复强调，他们才能听懂。

想要快速让他们形成科学观念并不容易。在当地数学教师唐诗均



为民小学学生在观察三球仪。

看来，不仅是孩子，有些家长都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他去一名学生家家访，推开门就闻到扑面而来的煤气味，家长却毫无反应。唐诗均急得说：下次再不开窗我就把这块玻璃敲了，但对于以为常的村民来说改变甚微。

唐诗均在为民小学教学的10年间，这里的科学教育仅停留在安全教育层面。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发生后，老师通常会简单普及一下相关的安全知识。对其他类型的科学知识拓展则是蜻蜓点水。

我们没有方向，偶尔讲一讲，很多孩子都心不在焉。本地教师也想给孩子们更多开阔眼界的渠道，但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的指导。之前几届志愿者也组织过“城市行”活动，但学校一般只有5个名额，都是推荐成绩靠前的去，成绩靠后的即使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机会。

每周一次的玩转科学课堂，则为更多孩子提供了突破环境限制、发现更广阔世界的机会。郭子鸣坦言，不希望一年支教时间孩子们会发生多大变化，但他相信在持续帮扶下，科学的魅力会像涓涓细流汇入孩子心中。

大山的馈赠

去年7月，作为第十七届研支团为民小学分队队长，路畅通过了郭子

鸣的重任。学期过去，她感受到了孩子们对科学课的热情。她给玩转科学社团上复习总结课时，每个孩子都把腰板挺得笔直，几个好奇的小脑袋时不时以为常的村民来说改变甚微。

当复习到垃圾分类，路畅问到哪种垃圾该放进哪个颜色的垃圾桶时，抢答声此起彼伏。这里的孩子表达欲都很强，路畅笑着说，我一张嘴就有人同时抢答，她觉得这体现了山里孩子的求知欲，他们总是对没接触过的东西充满好奇。

为了让孩子们养成思考的习惯，路畅每说三句话就会抛出一个问题，有时虽然她没有告诉他们答案，但我想让他们知道，答案的可能性有很多。

志愿者们认为，山里孩子的优势是离大自然更近，能接触到自然资源。希望他们能对身边习以为常的东西有更深入的了解，把科学课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当讲到时令和光照的关系时，有些住在山顶的孩子就会很兴奋，因为他们在家就能清楚地看到太阳从哪个方向升起和落下。

在实践课上，除了可以观察山中多种植被类型，研支团还在为民小学附近设置了一亩多的苹果柿基地，孩子们能亲身参与苹果柿树苗的培土、浇水、施肥、修枝等过程，并且定期观察发芽情况，跟踪植物生长。

在老师的引导下，变化逐渐发生。之前志愿者们家访，学生们都支支吾吾说不出植物的名称，现在他们不仅能够准确回答出植物的学名，还会主动分享自己发现的新问题。一个孩子把课上养的水培蒜苗当成宝贝，蒜苗长得老高也不舍得剪掉吃，天天盯着它写观察日记，就是想看看它能长什么样。

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志愿者会在教授主课时，见缝插针地帮学生复习科学知识。有次数学课，路畅讲到一道计算细胞分裂数目的题，就顺便帮他们回忆细胞、微生物是什么。另一位数学老师则在课前抽出3分钟播放《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等园林纪录片，既能帮他们收心，又能学到一些知识。

开启一扇窗

为了让孩子们接触到丰富有趣的科普内容，支教团联系爱心企业捐赠了各种科学套装和科普书籍，装满了器材室和图书室的柜子。

中午休息时，学生常会跑到图书室看书，与生物相关的书总是被很快抢光。有次路畅为了通风忘记锁门，孩子们一窝蜂地涌进器材室，怎么也不愿意出来，他们把这里当成家。

去年10月，路畅和其他志愿者带着20个为民小学的孩子去贵阳科技馆，她说孩子们一进去就玩疯了。有

的孩子去的路上晕车，刚进科技馆没几分钟，就开始撒欢儿。看到高压放电展区噼里啪啦地冒火花，孩子们虽然捂住耳朵、吓得往后退，但是眼睛里充满好奇，一直盯着火花。

这些微小瞬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人生轨迹。接触科学课后，六年级学生杨进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发明家，设计出飞得最快的飞机。平时在学校总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但他从没亲眼见过飞机的样子。他还对外太空充满好奇，虽然图书室那本《外星人未解之谜》里说有些地方曾出现过外星人，但他并不太相信外星人的存在，要再看看才能知道。

他总是在科学课上抢答老师的问题，但当他兴奋地告诉父母自己种下一棵苹果柿，他们只是说：学不好好上这种什么花。

为了提升村里成年人的思想素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支教志愿者在课余时间还会向村民提供粮食及果蔬种植、生猪养殖、食品加工与安全、普通话推广等服务。

去年11月，华农支团的玩转科学自然科普教育项目获得第三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指导老师王石告诉记者，我们还在打磨短视频和材料包的设计，未来我们期待能形成一种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惠及更多乡村小学。短视频和材料包由华中农业大学研支团的志愿者提出想法，本科生志愿者负责拍摄制作，博士生和专家教授负责把关审核，已经产出100多条短视频和4个主题材料包。

回到学校开始研究生学习后，郭子鸣作为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正带着即将开始支教服务的第十八届研支团志愿者进行课件开发和短视频录制。郭子鸣也在时刻关注着孩子们的成长，当听说他教过的一名学生初中物理、化学成绩名列前茅时，他心里很是骄傲。

他记得有次到一个男孩家家访，看到斑驳的墙壁上除了奖状，还贴着一张华中农业大学的明信片。男孩的姐姐曾跟着上一届支教志愿者到华中农业大学参观，回来后县里最好的中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她把明信片留在墙上，不断激励着弟弟妹妹。

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苹果树要3年才能挂果，虽然第一批种下的树苗还没长大，但郭子鸣相信，结出果实的那天一定会来到。

本版照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人物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记者 雷宇

尽管已从武汉西藏中学毕业12年，但边珍依然怀念在校过年的日子。一到藏历新年，同学们会穿着藏服，在彩色花纹木盒里放满炒麦粒和酥油糌粑，再插上青稞穗和酥油制成的彩花，做成切玛，还要给老师献上哈达。

被学生称为侯爸爸 的侯伯云每年藏历新年都很忙。筹备活动、找学生谈心，26年来，每年大年三十、初一，侯伯云都在学校陪着学生一起过。

在民族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从班主任到武汉西藏中学副校长，侯伯云探索出一套西藏班的管理办法，让远离家乡、父母亲人的藏族孩子慢慢适应了武汉的教学模式，他还牵头组织农工党爱心人士，推动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建藏援藏协会会员与藏族学生结对，为上万名西藏孩子找到了武汉妈妈、武汉爸爸。

侯伯云觉得，自己26年来就做了一件事：为一批在武汉求学的藏族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他几乎认识学校所有孩子

侯伯云始终记得第一次去接西藏班孩子的情景。当时10多岁的普布曲杰背着一个蛇皮袋，侯伯云伸手想帮忙，孩子却摇摇头，拖着蛇皮袋走了4公里的路，后来侯伯

武汉 侯爸爸 26年只做一件事

为异乡求学的藏族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云才知道，蛇皮袋里装的是普布曲杰初中4年的零用钱。临行前，他的妈妈将10元、20元零出的440元缝进行李中。

1995年，侯伯云从湖北省宜昌职教中心调到沙市六中西藏班（之后搬迁至武汉，成立武汉市西藏中学），当起了藏族学生的孩子王。

武汉西藏中学是湖北省唯一、全国首批内地藏族学校，也是全国最大的地方援建藏族学校。从西藏出发，这些10多岁的孩子以前要坐几天几夜的汽车、火车到武汉，接着面临长达3年甚至更长的异乡求学生活。有的学生在西藏牧区、农村，家里没人读过书。来湖北之前，孩子们普通话说不流利，也不爱与人交流。

起初，侯伯云跟西藏学生接触，找不到方法。他开始自学藏语，看到学生就用藏语打招呼，吃了没你好。

在边珍的印象里，侯伯云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他总是拿着藏文课本，碰到学生就拉过来做他的藏语老师。等到边珍从初中升到高中，侯伯云已经会唱藏族歌曲。

有一次，一个孩子找到他说：老师，您这么尊重我们，我愿意来跟你说说心里话。那时，侯伯云还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一

次上课，刚做完热身活动，普布曲杰转头跑回了宿舍，找来针线，一个人坐在床头缝裤子。侯伯云一问才知道，孩子只有两条裤子，一条破得不能穿了，另一条在上体育课时破了一个洞。侯伯云从家里找来裤子和鞋子，此后对普布曲杰给予了长达4年的资助。

该校教师许玉萍的班上曾有个藏族女孩旦增白吉那曲，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刚来学校，听不懂普通话，小姑娘躲在教室里哭，闹着要回西藏。侯伯云一有时间就来看她，跟她聊天。

许玉萍发现，这个内向的孩子一见到侯伯云就开心地笑，也会主动打招呼。到了期末考试，旦增白吉那曲从班级倒数考到前几名。许玉萍觉得，侯伯云是个内心充满阳光的人，会为学生们着想，很多事情比女老师想得还要细致。

侯伯云要求孩子干干净净的，讲卫生。周一升旗，每个班级的学生要把自己的手指亮出来，如果指甲太长，要当场剪指甲，宿舍里，床单要铺整齐，被子要叠成方块，有学生翻墙出去上网，他带着学校的老师一家家网吧找。

在西藏中学读书7年，边珍最亲近的除了任课老师，就是侯伯云，他几乎认识学校所有学生，他几乎承担了所有角色，

老师、爸爸、心理辅导师、朋友

我在江城有个家

2007年8月，第一次坐上从拉萨出发到武汉的火车，德吉拉姆穿着厚厚的藏服下了火车，走进家门，她看见湿热得多。在车站等候的西藏中学教师帮忙拿行李，带上学生刚脱下的衣服，开着大巴车送他们到学校。

对于家住西藏农区的女孩德吉拉姆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陌生。2012年3月，一次假期，侯伯云组织学生外出野炊游玩，德吉拉姆认识了农工党党员贺丹心，从此有了一个“江城妈妈”。侯伯云嘱咐德吉拉姆，有心里话要多跟妈妈交流谈心。妈妈每到节假日就会接她去逛街、看电影。

从西藏中学毕业后，德吉拉姆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一次过年前，她从学校赶到武汉看望江城妈妈。走进家门，她看见房间里放好了睡衣、拖鞋，桌子上放着煮好的排骨藕汤和她最爱的丸子。

毕业3年，德吉拉姆也一直跟侯爸爸保持联系，如果当初没有他，就不会有江城妈妈，我或许就不会遇到这么多好

心人。2020年初，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入职不久的德吉拉姆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交了口罩捐给母校。

10余年来，为帮助藏族贫困学生在武汉找到归属感，侯伯云联系农工党武汉市委员会、洪山区工委，在武汉西藏中学开展了10次大型结对活动，有100多名党员参与结对，捐款捐物近200万元，让200多名藏族孩子在江城武汉有了新家。

对于西藏的孩子来说，来武汉读书需要的是民族亲情，需要的是大手拉小手的关爱。侯伯云说。

出来是为了回去建设西藏

在学生时期，边珍曾觉得侯伯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而当他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才发现越长大越尊敬他。

和普通中学不一样，西藏中学的老师得24小时留校，住所就在学生宿舍的楼下。逢年过节，因西藏孩子无法回家，老师就陪他们一起吃年夜饭、跳锅庄舞、唱藏族歌。

那时一到春节，侯伯云的亲戚就提着特产，坐火车从荆州赶到武汉，跟儿子一起过年。他的宿舍里常常摆满了牛肉干、水

果，招呼着学生们来做客。

到了暑假，这群老师也会跟着学生坐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回西藏。到了拉萨，老师们忍着高原反应举办家长会，一家家地上门拜访。

这时，侯伯云是最忙的，学生抢着请他去家里做客。聚会上，有1995年毕业的学生，也有2010年毕业的学生，大家准备好青稞酒，唱着班上孩子都会的《妈妈的羊皮袄》，回忆在西藏中学生活成长的日子。

民族亲情在一点点传递。2019年从浙江警官学院毕业的旦增，假期特地回到母校，感谢侯爸爸，从初中到大学11年的资助，有一年端午节，普布曲杰工作的山沟没有信号，他骑了两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开到有信号的地方给侯伯云打祝福电话。

西藏中学不仅是一个学校，也是一个家，一个托举着我们成长的地方。如今她学到了知识、本领，未来想要回到西藏，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教育观念，让更多西藏孩子走出牧区、走出村寨。

在边珍心里，真正的偶像就是侯爸爸，他从民族教育26年，一直默默无闻、初心不变，她希望有一天，也能在教育一线做一位默默奉献的教育者。



扫一扫 看视频